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

经世与玄思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精神文明

章启群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



经世与玄思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精神文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世与玄思：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精神文明 / 章启群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中华文明史普及读本)
ISBN 978-7-301-13218-0

I. 经… II. 章… III. ①文化史—中国—秦汉时代—普及读物
②文化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普及读物 IV. K23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0581 号

书 名：经世与玄思——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精神文明

著作责任者：章启群 编著

责任编辑：王立刚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3218-0/K · 0510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河上图文

印刷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开 本：650mm × 980mm 16 开本 12.75 印张 15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引 言 /001

第一章 尊儒 /003

- 一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 /004
- 二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 /009
- 三 五经传承及今文古文之争 /013
- 四 讖纬之说与王充对讖纬的批判 /020
- 五 名教政治下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027

第二章 修史 /033

- 一 司马迁与《史记》 /034
- 二 班固与《汉书》 /040
- 三 地方史志的兴起 /046
- 四 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053

第三章 谈玄 /063

- 一 清议、清谈与玄学 /064
- 二 思辩的魅力——王弼玄学的特征 /067
- 三 自然与名教——玄学中的自然与社会理论 /073

四 率性自然的魏晋风度——玄学人性论中的时代精神 /079

第四章 佛音 /085

一 佛教传入和佛经的初译 /086

二 道安、鸠摩罗什和慧远 /095

三 范缜与佛教徒的争论 /107

四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09

第五章 诗意 /117

一 文学的自觉 /118

二 汉代辞赋与乐府 /124

三 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 /126

第六章 艺韵 /137

一 概述 /137

二 建筑之美：“非令壮丽亡以重威” /140

三 汉画艺术的写实与浪漫 /146

四 魏晋南北朝：中国绘画的本质转换 /149

五 凝固中的跃动：雕塑艺术的魅力 /157

六 佛教雕塑与洞窟壁画艺术 /164

七 东方神韵：书法艺术与书论 /171

第七章 道术 /179

一 道教的产生：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180

二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道教 /188

三 道佛之争 /193

四 道教与中国古代科学 /196

后 记 /201

引 言

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到公元 589 年隋文帝灭陈、建立隋朝，前后约八百年。这段中国历史从四百年的一统到大分裂，又回归大一统，政治上的统一和分裂几乎演绎到极致。在这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态势下，政治家们纵横捭阖，耕云播雨，弄潮时代。“一时多少豪杰。”有人千古留名，有人身败名裂。而战争和动乱给平民百姓带来的只能是水深火热，苦海无边。

但是，这八百年里，思想者、艺术家、诗人在做什么？

在思想界，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在汉代被皇帝定为一尊：“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时期学者们又大谈玄理，崇尚老庄；从印度传来的佛教终于在南北朝时征服了中土，从皇帝到百姓无不匍匐在释迦牟尼的脚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孔孟、老庄与释迦牟尼的思想经过冲撞、整合，终于相安无事。儒、道、释合一的中国文化精神内核从此形成。直到19世纪末叶，中国人在思想上一直没有冲破这个内核。

文学艺术在魏晋时期发生了非常显著而又深刻的转变，取得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独立的品格。魏晋时期首次出现了山水田园诗和山水画这样纯粹的艺术样式。中国古典绘画、雕刻、书法、甚至音乐，在魏晋时期不仅形成了基本形态和样式，还产生了典范和顶峰，诞生了无与伦比的一代巨匠和宗师，例如大诗人陶渊明、大艺术家顾恺之、大书法家王羲之。魏晋人形成了崭新的审美趣味，同时提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系统范畴，如“气韵”、“风骨”、“神”、“妙”等，在本质上影响了整个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趣味和理想。魏晋时期出现的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中国艺术的自觉”。

可见，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界、文学艺术界都出现了重大的转换，呈现出辉煌灿烂的景象。

本书描述的就是这些发生在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的事件、人物及其意义。这些内容都隶属于人的心灵世界。因此，本书展示的实际上是中古时期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尊儒

第一章

秦汉是中国统一的大帝国。这样的大帝国如何长治久安，是统治者及其御用知识分子们殚精竭虑的事情。除了一些制度、法令和具体的统治手段之外，是否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 and 理论，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南？

基于这种思考，儒学在汉代被定于一尊，作为法定的正统学说而发挥作用。其间，汉武帝“独尊儒术”是最具历史性意义的事件。自那以后，儒学在帝国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下迅速繁荣起来。在众多儒学大师中，以董仲舒和郑玄最为重要。他们的学说为统一的中华帝国的巩固和文化整合提供了理论武器。



图1 秦朝疆域图

一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国史书和博士官所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以及医药、卜筮、种植之书可以保存外，其余各种书籍特别是其他各国的史书和儒家著作一律烧毁。并规定如果有敢再谈论《诗》、《书》者杀头，以古非今者灭族。第二年，秦始皇又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在咸阳逮捕并坑杀儒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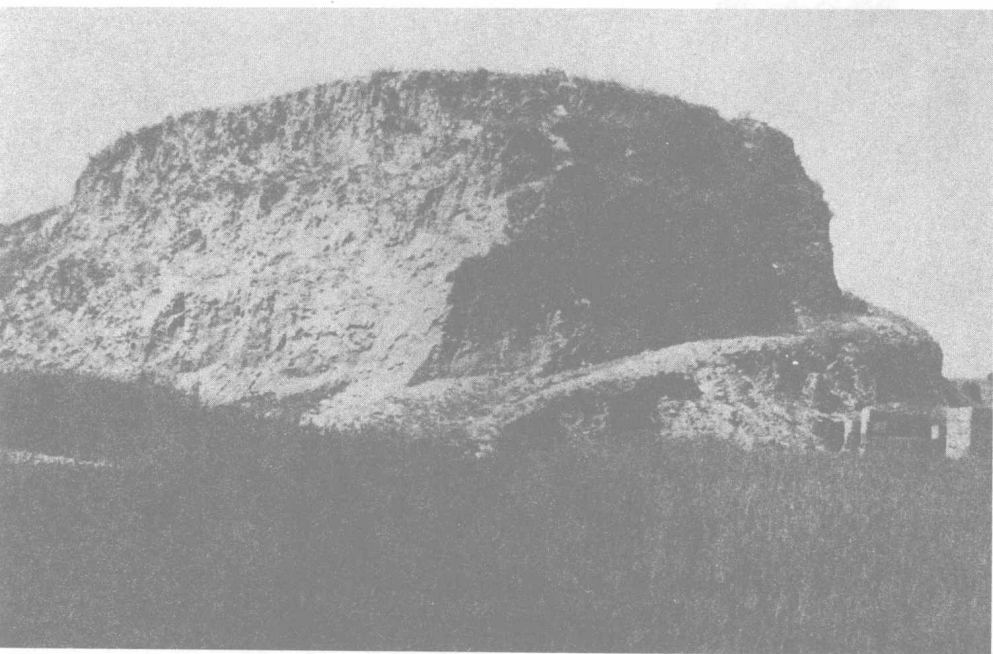


图2 陕西渭南秦焚书灰堆遗址

和方士四百六十余人。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了“定法教于一尊”，他所采取的是严刑峻法的法家治国方略，试图在完成对东方六国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之后，统一文化，移风易俗，建立并长久维持人们向往的太平盛世。

秦朝灭亡后，它的法治政策连带法家学说受到后代的统治者和学者们的深刻质疑和激烈批判。但儒学并未立即取而代之成为汉朝的正统学说。这首先与汉初统治者不好儒术有关。史称汉高祖刘邦厌恶儒生，甚至憎恶儒服、溺儒冠。丞相萧何制定汉朝律令，还沿用秦朝的《挟书律》与《妖言令》。惠帝、吕后时，公卿大臣都是武将功臣。文帝喜好刑名家的理论，景帝也不任用儒生。此外，汉朝



图3 秦始皇像

刘旦宅原作，李砚云改作

的建立是陈胜、吴广反秦起义的结果，但刘邦推翻秦朝后，又以秦国旧地为基础，向东征服了项羽和关东其他诸侯王，重演了秦灭六国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刘邦集团为了赢得秦人的拥戴，继承秦朝的军国主义体制，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关中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不得不承秦之制，大量沿用秦

朝的制度和政策。于是在汉初政治中，“反秦”与“承秦”成为相互矛盾的两大潮流，其中“承秦”又占优势。

不过，在汉初几十年中，儒学毕竟获得了比秦代宽松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汉惠帝以后，先后废除了《挟书律》和《妖言令》，儒生们又开始讲习和传授经典。他们针对“汉承秦制”带来的种种弊端，对秦政和法家学说展开了批判，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理论依据，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学说。

陆贾（约公元前240—约公元前170）是汉初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史记·陆贾列传》载其事说：陆贾常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称道《诗》、《书》，刘邦骂道：“我是从马上得了天下，难道还要用《诗》、《书》！”陆贾则回答说：“从马上得天下，难道就可以在马上治天下吗？”他认为古代商汤、周武王都是用武力夺取天下，而用文治守之，文武并用是长久之术。相反，吴王夫差等人过分依赖武力因此迅速败亡。他还说：“如果秦朝统一天下之后，施行仁义，效法先圣，你刘邦能得到天下吗？”刘邦听后面露惭色，命陆贾为他总结

秦亡汉兴的原因和自古以来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于是，陆贾著《新语》一书。

陆贾是针对汉初的政治需要提出具体政治主张和系统政治学说的第一人。他对秦朝政治的批判和为纠正秦政之失而提出的对策，符合汉初社会和统治集团的普遍心理，得到了刘邦的赞许，从而对汉初转变统治方式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他的思想虽有道家色彩，但其理论体系和基本口号都是儒家的，是先秦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的第一步。

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是汉文帝时人，著有《新书》。《汉书·贾谊传》所载《治安策》是班固概括、删削《新书》而成。贾谊的思想受荀子影响很大，是西汉前期荀子后学的重要代表。他激烈批评汉初政治，说“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违背自然天理而损害道义。进而要求文帝必须废弃“承秦”而来的法治政策，改行儒家所倡导的“德教”。贾谊颇受文帝赏识，有些建议也被文帝采纳。但由于朝中大臣反对，文帝又没有雷厉风行的决心，也由于“承秦”之弊端尚未充分暴露出来，贾谊的主张大多被束之高阁。历史表明，文景时期儒学占领政治舞台的时机尚不成熟。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公元前104）是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最重要的儒学大家和《春秋》公羊学大师，今有《春秋繁露》一书传世。他也激烈批评秦朝和汉初的法治政策，明确提出要抛弃“承秦”的法治政策，代之以儒家的“德教”。他在汉武帝进行对“贤良”的考试答问时，发表了著名的《天人三策》。他向武帝提出：夏商周三代得以稳固统治两千年的指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应当尊崇儒家学说为唯一的治国理论，废止其他各家的思想，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



图4 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书影，宋嘉定四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想。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的这个观点立即被汉武帝采纳。

由此可见，儒学复兴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汉武帝建元元年六月，他任命“俱好儒术”的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太尉，同时重用儒生王臧、赵绾，还把王臧、赵绾的老师申培从鲁国迎至长安。申培是荀子的再传弟子，汉初《鲁诗》和《春秋》谷梁学大师。申培师徒的政治主张与贾谊基本相同。但改革刚刚开始，便因武帝祖母窦太后的反对而归于失败。建元六年，窦太后卒，田蚡复出。他罢黜黄老、法家、刑名家等，招揽儒者百数，并对治《春秋》的大儒公孙弘以丞相封侯。于是天下风气大变，崇儒蔚然成风。儒学的正统地位从此确立下来。

与汉武帝初年不同的是，窦太后死后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是以董仲舒、公孙弘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派。《汉书·武帝纪》记载：在公孙弘任丞相期间，武帝又让董仲舒和申培的弟子江公当堂辩论，

而命公孙弘仲裁。结果董仲舒占了上风,《春秋》公羊学因此大兴。

二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

作为对以上政治主张的史学和哲学论证,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同儒家学说结合起来,以阐释《公羊传》的形式提出一套系统、精致的政治学说,建立了关于王道和天道的复杂的系统哲学理论。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按照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的解释:董仲舒吸取了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的思想,虚构了一个世界图式,来说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秩序及其变化的规律。照这个图式,宇宙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天与地是这个结构的轮廓;五行是这个结构的间架;阴阳是运行于这个间架中的两种势力。从空间方面想象,木居东方,火居南方,金居西方,水居北方,土居中央。这五种势力,好像是一种“天柱地维”,支持着整个的宇宙。从时间方面想象,五行中的四行,各主一年四时中的一时之气:木主春气,火主夏气,金主秋气,水主冬气。^①

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这个意志首先体现在阴阳和五行之气上。这种阴阳之气,充满宇宙。从阴阳与万物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基本的天意。然而,董仲舒实际上关注的中心是人。他说:“人,下长万物,上参天地。”(《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天是万物的主宰,人是万物中居特殊地位之最贵重者。天与人的关系构成了高于其他关系之上的一种关系。他的全部学说都在试图论述、证明这

^①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5页。

种关系。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的内在结构是相同的：人身就是天的副本。比如说，一年是三百六十六日，因此人体就有三百六十六个骨节；每年十二个月，人体就有十二个大的骨节。另外，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有醒眠。这基本上是不符合今天对于人的科学认识的。不仅如此，董仲舒还认为，人的内在情感、意志，也与天相符，人的哀乐就像天地的阴阳一样。人的一切，从物质的肉体到精神的存在，都是天的副本。董仲舒还给一些伦理规范，找到了一个宇宙论的根源和基础。像仁、义这些人的道德品质，都是与天的阴阳之气相关的。

同时，人类的社会制度、结构，伦理关系、秩序，都是与天同构的。例如，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天生阳贵而阴贱。还有，自然界春主生，夏主长，秋主收，冬主藏。在社会生活中，父生子，其子长之；父老，其子养之；因此父授之，子受之，是天之道。孝道，也是天的意志。这样，木生而火养之，金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相生的顺序，体现了君臣、父子、夫妇等所有的社会关系。

在这个严密的天人结构中，顺命者昌，逆命者凶。因此，董仲舒提出，必须依照天理对人欲进行调整。他认为：天命，必须由圣人来推行；人的质朴的本性，非教化不能养成；人欲，必须有制度来节制。因此，帝王必须上承天意，下教化民；建立法度秩序，以防人欲泛滥。只要做到这三项，治国的根本就抓住了。人的情感和

欲望必须与天理相合，才能顺命安生。

在董仲舒竭力论证“人副天数”（天按照天自己的结构来创造人）和“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按照自己的结构来安排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观念亦可以反过来说，即天的结构，或者说整个自然界，都具有人的本质特征。这里实质上存在着一个循环圈：人比附自然（天），自然（天）也比附人。所以，冯友兰说：“在董仲舒看来，人是宇宙的缩影，是一个小宇宙。反过来也可以说，宇宙是人的放大，是一个‘大人’。他实际上是把自然拟人化了，把人的各种属性，特别是精神方面的属性，强加于自然界，倒转过来再把人说成是自然的摹本。”^①这个论断是十分准确的。譬如，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衰气也，故藏。”（《春秋繁露·阴阳义》）这里的自然，完全是以人对自身的比照来想象的。天也“与人相副”，是一个放大的“大人”。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成了人的对应物。故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变成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感应，也就非常自然，非常合理了。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的感应，从表面看是自然无痕迹的，但却有一种内在的互动，就像弹琴一样，一种声音会与另一种声音产生共鸣。物类相感是一种自然的感应，这是早期阴阳五行家的思想。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家认为，凡同类的东西，是可以互相感应的。董仲舒亦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天人感应，主要是天对人君、王者所作所为的反应。这一思想早在《尚书·洪范》中就有明确表述：“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即人君的貌、言、视、听、

^①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第66—67页。

思五种行动。意思是，这五种行动，如有不当，就会引起五行的变化，表现为四季的失常。而董仲舒则更详细地讲“五事”和五行相感应的关系。他说：“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俗习，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时而当，则岁美；不时而妄，则岁恶。天地人主一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他认为四时运行不当则岁凶；人君喜怒赏罚不当则世乱。庆赏罚刑是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所以，大自然的太平与社会生活的盛世，自然灾害与社会动乱都是一致的：“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僻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灾害起。”（《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像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祥瑞，是社会昌盛兴旺所造成的感应。比如：在西周将兴之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飞到周武王的屋顶上。武王与诸大夫皆喜。周公就说：“茂哉！茂哉！天之见到我们的兴旺也来帮助我们了。”所以，一些自然的特殊现象，就成了对人君的褒奖或警示。董仲舒还把这一观点联系到孔子的“春秋笔法”。比如，《春秋》记载地震、山崩、彗星等现象，以此见悖乱的征兆。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根本目的，是为现实的统治者服务的。这也是《春秋》公羊学以及整个今文经学的学术目的。天有喜怒哀乐，灾异是天的意志的表现。但天意是随人君的行为而变化的，所以，天意也是与人相关的。就是说，天可以制约人，制约人的目的也是为了人。人的行为要符合天意。这里好像有个循环。但实质上，天是次要的，人是主要的。

从哲学自然观的角度来说，董仲舒的学术在整体上是对先秦朴素的哲学自然观的另一种演进。在董仲舒天人严密对应的宇宙结构中，人和自然则处在一种神秘的对应关系中。可以说，这种关于人